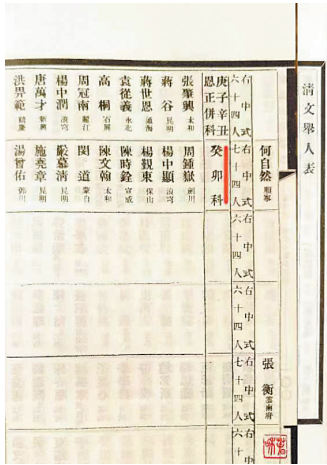


云南的最后—科乡试

张 佐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恩科云南乡试,是云南举行的最后一科乡试。第二年,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科会试和殿试后,在中国盛行了近1300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落下了帷幕。



《新纂云南通志》卷十六“清文举人表”对1903年癸卯恩科云南乡试中式者的记载



云南贡院腾蛟坊上的“为国求贤”匾 耿嘉 摄

云南贡院为国求贤坊在科举终结后转为东陆大学之门

精心出题 不辱使命

据《光绪要要》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农历七月十六日(公历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力主改革科举:“科举为抡才大典,我朝沿袭前朝旧制以八股文取士,名臣硕儒多出其中,其时学者皆潜心经史,文藻待其绪余,乃行之二百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首场试中国政治史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第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生童岁、科两考也要考中国政治史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并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并明确规定“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

癸卯恩科云南乡试的内廉主考官是翰林院编修张星吉,副主考官是翰林院编修吴庆坻,同考官为田亮勋等八位云南知县级的官员。外策官为云南巡抚林绍年和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科状元、云南学政吴鲁等80人。主持考试和负责出题的张星吉和吴庆坻虽然都是学问深厚的翰林院编修,对如何主持乡试和如何出题都有一些经验,但该科乡试不考八股文,考试从内容到程式都与从前不同,衡文的难度也比以前大得多,必须认真考虑、仔细斟酌、反复磋商拟定出朝廷认可,考生能接受的考题,才能不出批漏。二人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设计了一套既有时代特色又继往开来的考题。

第一场论题

- 一、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论
- 二、唐太宗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省内,款延见,问民疾苦,政事得决
- 三、宋太祖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论
- 四、韩琦制义勇,司马光力争之;王安石行保甲,司马光请罢之论
- 五、滇边形胜今昔不同,试举历代控制三方、舆地险易之势,博稽图籍,以筹边备论

第二场策题

- 一、东西诸国致富强之政,实与《周礼》隐合。试详加甄别,引申其说,使学人知古者即维新、新化中西畛域之见策。
- 二、泰西商务出口税轻,入口税重,所以防利源外溢也。且董以商会、平以商律,辅以银行,以故商务日兴。中国自互市以来,利权渐失,朝廷特设商部,改订商约,应如何妥筹?抵制之方以收利权、裕度支策。
- 三、西人精研农学,具有专著。中国地广民稠,宜设农学、劝垦荒,采西法,讲求园艺、畜牧为殖民阜财之计策。
- 四、兵强固在利器,然将帅非人,利器无用。泰西水陆将弁出自学堂,故将皆知兵,兵皆知字,其练将之法若何?称名将者几人?宜仿其良法实力,整顿武备学堂以储将才而苑军实策。
- 五、各国皆用金本,一时骤难仿行。宜广铸银元,精良画一,以就国法之敝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题

- 一、“国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义
- 二、“乐天者保天下”义
- 三、“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辩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义
- 统观这套考题,内容涉及古今中外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以及云南的边防,即使是传统的四书、五经题也与当时的社会改革有关,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考题视野开阔,设计周密,用心良苦,张星吉、吴庆坻两位考官确为不辱使命之人杰。

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云南乡试,参考的云南士子多达3769人,年纪最小的考生仅有十四五岁,年纪最大的考生竟有六七十岁。由于是最后一次乡试,大家无不摩拳擦掌,奋力一搏。放榜时,录取正榜66人,副榜10人,共76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二。其中解元(举人的第一名)为二十六岁的剑川人周钟岳,亚元(举人的第二名)为二十五岁的浪穹(今洱源)人杨中显。

周钟岳高中解元,其三场考试的试

卷均得到考官们一致好评。云南著名学者海澱先生主编的《云南考试史》:先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云南乡试》对周钟岳一、二两场考试的答卷有如下详细分析:周钟岳选做的第一场第五题“滇边形胜今昔不同,试举历代控制三方、舆地险易之势,博稽图籍以筹边备论”,作者通过对古今滇边防务要略的对比之后,指出,云南过去所谓“九隘八关”的边防体系早已过时了。当今局势“夔攘缅甸;法据越南。是为越、缅两防最为重大。”周钟岳还具体提出了新的边防体系。第一是“筹西防”——建议以野人山为其要地,“守野人山九道,以遏其阑入”;其次“孟良在路江之滨,为边隅重镇”;“树浆厂……为藩篱锁钥要地,不可为外人所据”;第二是“筹南防”——建议先“屯兵于河口,而分防于那龙、龙陵、新店、老卡、茅坪、天保、董干、田蓬、诸沅,以为策应。”再以“九龙江之六要隘,木嘎、昔里方之二要隘”作为后备防线,则“云南可守矣!”从该文阐述的观点可以看出周钟岳对云南的边防颇有研究。

周钟岳选做的第二场第四题“兵强固在利器,然将帅非人,利器无用。泰西水陆将弁出自学堂,故将皆知兵,兵皆知字,其练将之法若何?称名将者几人?宜仿其良法实力,整顿武备学堂以储将才而苑军实策。”周钟岳对这一连串问题的看法是:“兵器再好不如将与兵得人得练”。泰西“练将”是从小培养,“练兵”则兼备论,且其武备教育不仅仅是练习军事技术,更要学习数学、几何、史地等文化知识。“练兵”则重视战前演习,如其海军“选派至兵舰练习,风涛海操已熟,乃赴水师学堂学习驾驶”。等考试合格后,才可带兵打仗。并列举了惠灵吞(顿)、哈飞、毛奇、绿纳尔逊等西方著名将领,称赞他们“非知兵识字,文武兼资者乎?”于是论称“练兵犹易,练将为难”,强调将帅必具有“胆识”和“技艺”——“审形势,演阵法,习测绘,精驾驶,认沙礁,皆为将兵者所有事。”同时,还须进一步学好战术学、营垒学、地势学等,因此,中国必须尽快办好武备学堂。

对于传统的四书、五经义题,周钟岳更是成竹在胸,写出了既符合儒家思想又颇有新意的优秀文章。第一位阅读周钟岳试卷的房考官冯江,对周钟岳的试卷极为赞赏,总批语是:“条陈详明,荐!”副主考官吴庆坻的批语是:“深明大略,取!”正主考官张星吉对周钟岳的试卷更是爱不释手,总批是:“老成画,中!”

周钟岳考中举人后,成为民国年间云南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周钟岳从日本弘文馆师范专业毕业,又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政法,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回国后,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云南学务公所课长、昆明“重九起义”后,历任云南都督府军政部参事、参议院参事、登庸局局长、都督府秘书长等职。1912年任云南教育司长,1913年被袁世凯任命为滇中观察使,1914年任北京政府经济局秘书长,1917年任四川督军公署秘书长。1918年回滇,历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代理省长、省长、盐运使、秘书厅厅长、内务司长、民政厅长、省务委员、内务厅长、通志馆馆长等职。1939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咨政等职。1953年任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1954年担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

周钟岳是一个政治家,教育家,更是知名文人和学者。长于写公牍的周钟岳,最受蔡锷、唐继尧的器重,他的重要文电,多出自周钟岳之手,而他的书法得其舅父罗文昭及老师赵藩的传授,笔法雄浑、结构严整,留存于昆明五华山光复楼“光复楼”横匾、石林大石林景区的石刻“石林”、南京总统府大门“总统府”直匾等都是他亲自书写。周钟岳的诗文主要收编在《惺庵诗稿》《惺庵日记》《惺庵回顾录》内,他17岁便写诗,58岁时已作诗700多首,袁嘉谷称赞其诗“古体原本于韩,近体逼杜,诙奇之趣,工巧之对,妙造无匹,苏为近之。”1917年底,周钟岳跟随唐继尧进军四川重庆,途经贵州毕节时,见战争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深感不安,写下了一首忧国忧民的七律:“山店烦冤劫后人,千村寥落甍生尘。贼

来尚可兵无横,生已无归死屡频。那忍疮痍看满地,孰能偏袒救凡民。伤心万物为刍狗,天地于今岂不仁。”

周钟岳的一生,著述虽然很多,但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是他主持编纂的《新纂云南通志》。《新纂云南通志》以岑毓英监修的光绪九年《云南通志》和唐炯重修的光绪二十二年《续云南通志稿》为底本,旁参谢启昆《广西通志》、阮元《广东通志》、黄彭年《畿辅通志》、王轩《山西通志》、章学诚《湖北通志》,纪事自上古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全书共266卷,分装成140册,计648万余字,内容丰富、取材精当、持论谨严、体例完备、观念新进、多有创新,其成就不仅超过了云南历代编纂的旧方志,而且达到了民国时期全国新修方志的一流水平,是上世纪前期云南学术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精英群聚 成就斐然

包括第二名举人(亚元)杨中显在内的此次癸卯科云南乡试中式举人,绝大多数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大部分人在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癸卯科云南乡试的66位举人中,有施尧章、舒嘉猷、闵道、张肇基4人挤上了末班车,考中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连捷进士。其中昆明人施尧章,年仅十九岁就考中第二甲第五十九名连捷进士,是甲辰恩科年纪最轻的进士之一,官至吏部主事。舒嘉猷(1871—1946),鹤庆人,三十三岁时考中第三甲第十名连捷进士,二十四岁考中第三甲第六十九名连捷进士。张肇基,宝宁(今广南县)人,三十六岁时考中第三甲第一百二十八名进士,官至河南濬县知县。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中国的科举考试终结,癸卯科云南籍举人中,仍有不少人因到国外留学或在国内的学堂深造毕业成绩特别优秀,而被清廷奖以专业进士的荣誉称号,如丁兆冠、金在谔、董玉书、赵文龙、丁中立、林嘉瑞、郑永清、王桢等,这些人中以丁兆冠、王桢二人为有名。

丁兆冠光绪癸卯(1903年)科乡试中举,官至(1904年)科会试不第,即选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留学。毕业回国后,应学部试,名列二等,授法政科举人;殿试一等,除内阁中书,改分四川即用知县。辛亥革命后,丁兆冠任四川财政部司长。不久,辞职回云南,任云南政法专科学校校长。丁兆冠因其才干一直颇受重用,民国十四年(1925年),历任云南省高等审、检两厅厅长,兼任司法厅厅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云南省政府改组,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尔后多次请辞未许,至1938年,再次辞辟,始获专任省政府委员。1949年12月,云南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丁兆冠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桢可谓少年得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云南乡试,年仅十八岁的王桢便考中了举人,后入京参加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但因该科会试是最后一科会试,竞争十分激烈而落第。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桢入云南法政专门学校深造,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荣获进士头衔。民国二年(1913年),中华民国成立国会,王桢被选为众议院议员,赴京供职。其最大的成就是于1929年前后,以耀龙电灯公司股东的身份,被选为商股董事兼公司经理。王桢任经理的五年期间对耀龙电灯公司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改革与建设,公司发电量剧增,使更多的市民用上了电灯,而王桢在昆明也成为了响当当的名人。

癸卯恩科云南乡试虽然是最后一科乡试,但依然为当时的社会发展选拔储备了一批人才。这届乡试没有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不仅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现在的人才选拔,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价值。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编者按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这是一条思想解放之路。45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到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活力。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这伟大进程中,云岭大地涌现出一大批勇立时代潮头、锐意进取、敢于实践探索的先锋模范,他们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成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推动者、亲历者。

本期开始,文史哲版开设“改革开放45周年·云南故事”专栏,用鲜活的历史,讲好改革开放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展现改革开放45年来的伟大成就,汇聚磅礴伟力,谱写改革开放云南新篇章。

何正喜的1556元超产奖该不该发?

端和巧

1977年,楚雄州元谋县大塘子村生产队会计李国有给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信里建议“将任务产量联产到组,对超产计划产量的组和对集体贡献大的个人给予奖励”。谁也没想到,这一封信不仅影响了大塘子村,也影响了楚雄州以及整个云南省的改革进程。

当时的元谋县委根据李国有提出的建议派出工作队实地调研,制定出一系列管理办法,新的管理办法实施一年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随后各县纷纷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为解决集体养蜂场亏损困境,1978年初,大姚县作出了《关于集体蜂场实行超产奖励和减产严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集体蜂场建立“四定一奖”(定面积、定产量、定成本、定报酬,超产部分奖给作业组,组里再评定到人)政策,切实推行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决定》下发后,大姚县农民何正喜主动站了出来,承包了大队的一个养蜂场。何正喜从小跟着父亲养蜂,耳濡目染中掌握了养蜂技术。1961年,他从部队退伍后回到家乡,打算继续发展养蜂“事业”,为了提高专业度,何正喜从书店购买了养蜂专业书籍,开始钻研养蜂技术。他利用业余时间,一边学习新技术,一边改进家中的养蜂方法,经过不断尝试改进,他的养蜂技术得到了很大提高。1975年大姚县赵家店公社毛碑田大队办起养蜂场,何正喜成为了专职养蜂员。

1978年3月,何正喜承包大队养蜂场后,一刻也不敢懈怠,把日常学习的技术运用于养蜂中,通过艰苦努力,精心饲养,蜂群饲养量和蜂蜜产量都超过了全县养蜂生产的最高纪录,当年产蜂蜜6274公斤,纯收入11384元,超收9029元,扣除国家对蜂蜜提价因素,实超收7782元,按承包时规定,以超产部分20%计奖,他应得奖金1556元。12月21日,赵家店公社召开按劳分配奖励兑现大会,何正喜戴着大红花坐上主席台,领到了1556元的超产奖金。1556元的奖金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之前县里对农副业生产队的奖励大多是一些口粮、毛巾或象征性的奖金,这么高额的奖金可谓是稀有出现。

一石激起千层浪,何正喜获得超



养蜂能手何正喜(资料图片)

产奖金1556元的消息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79年1月17日,新华社以《养蜂能手何正喜获超产奖一千五百多元》为题向全国播发了通稿。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云南日报》等全国26家报纸转载了这条消息。与此同时,各地对何正喜这1556元奖金该不该发展开了争论。《云南日报》《楚雄通讯》以此为题专门开办专栏,展开了历时半年的大讨论。楚雄州从中得到启示,决定以“何正喜1556元奖金该不该发”为题,在全州干部、群众中开展一场讨论。大姚县随即召开了奖金问题讨论会,会议认为,如果不把奖金的合理性讨论清楚,就可能出现在制定下年生产计划时,一些队卡高指标,以致奖金拿到不到,或者兑奖阻力增大等问题。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何正喜超产1556元奖金并不多,这是何正喜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拿给农民,不会改变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有的认为,何正喜的奖励完全符合《关于集体蜂场实行超产奖励和减产严惩的决定》;还有

金占了上风。

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经过热烈的讨论,得出了相对统一的结论,奖金是按劳分配的表现形式,是我国现行固定的劳动报酬制度的一种补充。而奖励制度的实行,才能更好地落实“四定一奖”政策,才能解决好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率,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这场讨论不仅促进了农业责任制的实施,捍卫了奖惩制度,同时也极大解放了群众的思想。《云南日报》在大讨论结束后作出总结:“我们从这场讨论的文章中,听到人民群众要求发声的呐喊,看到思想解放的火花。”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推行的一项重大改革,它的推行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云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端相对较早,它的推行是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智慧的结晶,为云南农村生产力解放起到助推作用。对“何正喜1556元奖金该不该发”进行的一系列讨论,是我们在推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次破茧,正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和实践中,我们解放了生产力、消除了贫困、创造了发展的奇迹。

(作者单位为省委党史研究室)



百年海口川字闸:滇池治水之见证

海口川字闸是古代人民治理滇池的智慧结晶

海口川字闸,又名屢丰闸,位于昆明海口河滇池出水口处,是一座桥闸结合的多孔石拱桥,滇池水经此闸导入螳螂川、普渡河,流入金沙江。川字闸建于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迄今已有187年。全长109米,共21孔,桥面宽3米,分跨于由河心小岛分隔形成的三股河道之上,每个桥孔两侧桥墩设沟渠,可启落木板为闸,故称川字闸。海口川字闸是我国最大的古代桥闸结合的多孔石拱桥,如今南桥闸保存最为完整。川字闸是滇池蓄水、排水的枢纽工程,既是古代水利设施,又为水陆交通提供了方便,凝结着滇池水利文化的精华,被誉为“古桥闸之典范 滇池治水之见证”。2019年,昆明海口川字闸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本报记者 杨峥 文/图



桥面被磨得锃亮,显现出岁月的痕迹。游人往来驻足,与时光合影。